

创作谈

把自己交出去

□阿 郎



《铁锈新鲜》，阿郎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9月

他人和自己的眼中和心里。我将这两个几何形状，无限复制粘贴，再用空间串联起来，这些单一最后变得繁复，就像火点燃火焰，水消失在水中。我们都渺小如斯，也都独一无二地伟大。

二

我理解的结构，是空间实体与时间维度的交叉支撑。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多年漂泊，对东北这块土地已然陌生了。我好像在躲避什么，偶有旧友提及往事，也漫漶不清，听来像是别人的故事，有恍如隔世之感。这次写作，很多细节被唤醒，那些人和事滚滚而来，泼溅成画，跌宕自喜。我从故乡雪雾弥漫的街道上走过，从烟熏火燎的筒子楼旁走过，从我的邻人师友旁走过。只有我自己走过去，我笔下的人物才能走过去，才能走进迎接新世纪的鞭炮里。

这次写作极痛快，我好像是进入了本雅明说的那种灵氛中，几乎一气呵成。我似乎多少懂得了一点黑格尔说的，人必须从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出发，才能开始精神上的远行。

《风雪夜归》是三个故事最后汇聚成河，我有意让三个故事都倚靠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第一个故事里的小邵面临下岗问题，随着全国工业结构调整，东北的重工业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国有企业工厂开始裁员，东北开始出现离婚、盗抢、打工潮等应激现象。李闯的母亲就是南下打工者的一员，李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他最不能忍受别人骂他有娘养无娘教，同时开始恨那些父母都在身边的孩子。有时候爱是透过恨表现出来的。

第二个故事里的“我”在派出所当合同工，是第一个故事里大家公认比较好的归宿。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恐慌，“我”的理想被研磨成一个编制的形状。第三个故事里出现了“严打”的大背景，“我”是高校刚毕业不久的护士，是我社会理想

的化身。我希望她好。我想写人在时间之海里的游弋，与风雪、游尘、大地、星辰产生不可逆的关系。我们一边愤恨，也一边热爱这壮阔的人间。

三

我尽力写我，但避免写我的事。好像在一个人的写作初期，总是无法避免以个人经历编织故事。我喜欢人类学家项飏提出的那个观点：关注你的附近。我想写附近的他者，以至于我最想写的那个人，都是通过旁观者的视角去呈现的。比如《风雪夜归》里的母亲，比如《疼痛的秘密》里的父亲，比如《铁锈新鲜》里的少年，比如《西边有座山》里的歌队，比如《夜宴》里的安然。

我抗拒用很文学性的笔法去写人物内心，即便是笔下的人物，我也不愿将其一览无余地交给读者。我写动作，人物的潜意识蕴含在动作里，每个人看到的都可以不同。后来，有读者重读《如山》，从我对创辘的细节描写里，发现了老姨夫的另一面。我有一种心事被揭穿后的感激。

我想写那种庞大的偶然性，所以在《铁锈新鲜》里，我写了一起不像案件的案件。起码，在这起发生了确定性伤害的事件里，没有人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想要伤害什么。作恶者原本和我一样，只是普通人，当处于某一临界点后，在电光石间做出了选择。在选择之前，他平凡如蚂蚁，在选择之后，他不再平凡，但却十恶不赦。

我甚至不想写站在传统意义上正面的一方，讲述他们如何慷慨凛然、处变不惊。我想让双方都陷入到巨大的不安之中，正邪双方在事件最终真相大白前，经历着同样的煎熬。他们一次次在刹那做出决定，散发出同样的危险气息。

我想写附着在案件上的斑驳人性。我尽量写人的复杂性，尽量写一些人的弱小，以及这种弱小在遭遇某些事件后的突变。我也写写一个个人强大的背后，那些刹那间柔软的时刻、怀疑的时刻。我想用软弱写坚硬，用残酷写温情，用个案的偶然去写人类历史的某些必然。

在具体的案件里，我不想写顺藤摸瓜、水到渠成，我想写在事件追索过程中，那些旁逸斜出的部分。我想看事件如何一次次超出逻辑之外，又如何一次次震荡回归到另一套逻辑中，就像小径分叉的花园。

在《疼痛的秘密》里，我写年轻的父亲，比我现在年轻更多。写他的自私、猥琐、世俗，也写他的纯白、天真和光芒。

在文学作品里介入个人经历，无疑是令我羞耻的，我想回到词语本身，回到动作本身，去完成它。我把我从经验的城邦中摘取出来，只要我够坦诚，可以诚实面对我的懦弱、自私、虚荣、浅薄，我才不再是我，我笔下的人物才是各个不同侧面不同时间里的我。我与他们相处，记录他们的呼吸和眉目。

我想写大地上素不相识的人，写他们热热闹闹的孤独，震耳欲聋的沉默，声名狼藉的成功，金碧辉煌的自治。

我想把自己交出去，交给对面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谁的阅读的人。

最终结局。我国国企的改革历程，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我在这部小说中反映和记录了我国国企改革至少20年的发展历程，所选取的样本就是天泉公司。作品所描写的天泉公司的发展脉络，始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发展规律等时代大背景相吻合，可以说，天泉公司的历史，形象地折射出了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及其发展前景，这也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立意。

在人物塑造方面，我着力塑造了一位有理想、有胆识、锐意改革的当代企业家形象——天泉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戚志强。通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情节，小说多角度、多方面地刻画了戚志强深谋远虑、敢做敢为，既不平庸保守，又不盲目躁动的大将风度。作为第一代企业改革家，他身上既有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经济思想的烙印，又有改革开放后历练出的眼界与胸襟。这个形象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有其典型意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他身上没有完全摆脱土生土长的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某些思想局限，但他的素质和作风却是正面的积极的。

这部小说从题材上看，是写企业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但我并没有局限于写社会和企业的变革，而是力求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力求以强烈的文化意识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和追求，使读者对现实生活产生新的认识。我想以此来记录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的进程，记录这一进程中发生的故事，及其带给人们的思索。我对社会现实和人生一直是取积极态度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通过对事件和故事的叙述，塑造了老一代国有企业负责人与新一代国有企业负责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和价值观的异同，进而刻画国有企业负责人恪守政治、法律、道德、情感底线的智慧与才能、信念与理想、艰难与追求、探寻与求索，尽力展示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理想主义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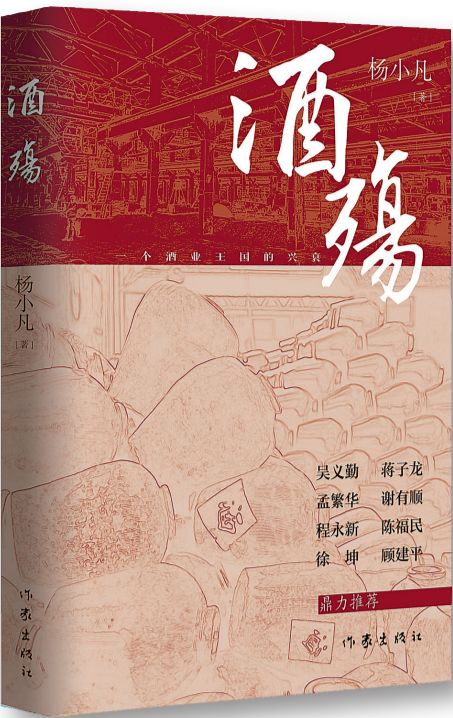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就是你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长篇小说涉及一套对世界的假设，比如，我相信自己是在讲述一个重大的、关乎人性的故事，相信这里边有命运，有英雄和受难者，有诉诸所有人的重要情感和困境。有这样的追求与写作逻辑，小说才有可能变成有价值的文本，题材、事件、人物、细节才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在《酒殇》中，我表达了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那近20年间，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政府人与企业人之间、政治计谋与企业韬略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多重博弈与主题变奏。国有企业的命运、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命运，被放置在一个极具艺术真实的背景下展开，目的的正当伟大与手段的萎缩扭曲，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壮与崇高。

如今，我在类似《酒殇》这样的国有企业工作已近30年，从基层员工一直到担任高管。基于这种背景，总有人会好奇我的小说里有多少是真实故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与我服务的企业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小说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是评判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一个作家的生活记忆与他的叙事资源是密切联系的，但虚构和想象同样至关重要。在虚构的世界里，所谓的真实就是对自己所写的人和事深信不疑，只有你相信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有内心足够强大，你写出来的世界才会有足够的重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才可以说，这部小说里的人与事，并不是我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人与事。

生活之树常青，作品永远来源于生活，作家永远是在生活之后的。我的经历使我有一批体制内和企业中的朋友，他们都是说真话的，书中的很多人物都有我生活中熟人的精神特质，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因为这些人的神采已经深深烙在我记忆中了。他们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与他们的感情，让我不得不以文学的形式对他们多一点点关注和关心。这也是我以写作，对他们、对自己以及自己这些年生活的一种回报。

不应被忘却的记忆

□杨小凡



《酒殇》，杨小凡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9月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写法。这是我的写作偏好，也是我的文学追求。

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作家也一样。我认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对当代生活有所作为，在当今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不能思考缺席、不能失音、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哪怕以史鉴今或借科幻喻今，总要与现实和人心相关联、有响应。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作家，就远离了读者和社会。

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加盟国内一家白酒企业，从而进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前沿阵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曲折、艰难的前行之路，真的太值得大书特书，它是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历史存在，影响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企业的直接经历及间接见闻，使我感受到了国有企业在产权国有、所有者缺位、政企不分、体制僵化、机制不活的生存环境中，在残酷的国内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夹缝中前行的艰难，而且最终由于体制机制不活、效益下滑、外企争夺等原因，只能以产权改革的形式走向民营化。此外，在当时的背景下，作为资本经营者的国有企业掌门人，在与代表资本所有者的政府官员的互动中，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你来我往的较量，其内心深处自我判断都是复杂的。这种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人格化，在运营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背离经济规律的，真正起作用或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人，那么，人的优劣、人性的复杂便转而影响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种创作的冲动和思考便自然生成。

近年来，工业题材、改革题材的小说一直不够活跃，我认真思考其原因，可能是作家对这些题材的深入了解不够，写出的作品不能打动读者。作为长篇小说写作者，如果对要写的题材不熟练，甚至没有亲身经历，仅靠采访、资料、虚构，可能真写不出有血肉有筋骨的作品。但是，有经历了也不一定写好，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它不能是现实的照搬和摹写，必须在深刻理解素材后，进行高于现实的全新虚构。

基于此，我以天泉酒业为背景，镜像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改革、改制的艰难发展历程。天泉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但固守了“天泉御酒”全国名酒的品牌地位，同时通过一系列收购措施，从单一的制酒公司发展成为经营多种业务的天泉集团。我对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情节和细节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描写，力求环环相扣，充分展现经济领域中的资本积累与商业运作，以及政企之间、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生存环境，真实反映国有企业现状以及国企改革中错综复杂的诸多因素与矛盾。天泉集团经过艰苦的努力与运作，终将改制成功，这是我呈现的带有理想主义的

《别来春半》的书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清平乐·别来春半》。时光流转，怅然回首，发觉原来人间春日已过去多半。韶华易逝，光阴不再，在这样好的春光里，词人面对种种往事如烟，只能独自伤春缅怀。怀着初读到这首词时的惊艳和与之相似的心境，在挚友鼓励下，我收集归纳了从高中到研究生时期的部分作品，汇成一部虚构故事散文集，来纪念我“逝去的青春”。

也许有人会问，作为年轻人，放眼望去，有着大好前程与无限可能，有什么好缅怀的？但我相信，在每个人生的阶段，人们都承载着那个年纪特有的心绪与愁思，其中不乏对自身的叩问与对世界的思考，无论理性还是感性，都有被记录的意义。我笔下的许多故事，也许是主观且片面的，但当读者从中能够获得启发、产生共鸣时，那力量是可以跨越时空、文化以及个人成长背景的异同，将天南地北的人们凝聚到一起的。《别来春半》中如伤春般的浅淡哀愁，并非只是少时情绪的起伏与躁动，更是为了记录一段已永远成为“过去式”的青春迷思。“伤春”是为了更好地“惜春”，从而不辜负岁月流转。正因如此，书中的所有作品都尽量保留了初稿的笔触与风格，并没有进行过多修改。

我的创作过程非常随性，经常是想到哪写到哪，少有运用大纲或草稿。我的写作并不为了取悦任何人，也没有异常强烈或具体的创作目的，更多时候只是想把当下的情绪和心境用文字具象化，就好比电影中的某一刻——无论美丑好坏，甚至可能没有完整的背景叙事，但依旧令人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感知的一种真诚记录。即使是在虚构的小说里，我也希望做到虚中有实——艺术源于生活，文学并不只是阳春白雪。只要能够把普通人

带来属于时代的温柔力量

□刘 倩

的经历，用或宏大或细腻叙事手法叙述出来，那么无论文笔风格如何，我觉得都是了不起的。诚然，我在创作的路上，还需多加修练。但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始终是我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写作的思想根基。在谈论风花雪月的时候，文学多是美而缥缈的；而在批判世俗的时候，则多是苦而尖锐的。正是这种多元性，反映出了个体在世间的生活浮沉。很多人读书写作，喜欢挑食，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创作者，这是我必须引以为戒的事情。

一路走来，求学海外，受到东西方文学的影响，我的写作风格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与成长。但我愿意全心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并不刻意给自己下定义或设限。从事学术研究时，我曾学习过亚洲和欧洲的多种语言，但与我有着最深刻的情感与文化羁绊的，仍是中文。在美求学多年，无疑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和思路，但对外语的频繁使用以及不同语境下的学术环境，也让我不断思考着自己与母语间的关系。中文不再只是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而存在，更是我个人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是我用以抒发见闻感想、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坚实桥梁。坚持中文创作，讲述中国人以及中国留学生的故事，一是提醒自己的文化根基从何而来，二是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分享给更多人。《别来春半》作为我的出版处女作，无疑是稚嫩的、有待完善的，但它可以算作是我对

中文、对中国的一封热烈情书，是我对年轻时坚持创作的自己的一份独特见证。其中流动着的，不仅有少女的情思，更有一名女性的独立思考，以及她历经挫折、成长为人的力量。古往今来，各朝各代名家数不胜数，但能够被铭记的女文人却屈指可数。身为一名女性，我坚信女作家们应该突破更多枷锁和束缚，勇于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每一缕细腻到头发丝的心愫，每一个或重或轻的梦想，只要能够大方落地表达出来，已是勇气可嘉。即便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我已迈出了第一步。

谈到中文写作，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古典文学，谈到民间传说典故和古诗词对我的重要启发与影响。《别来春半》首章中的作品，收录了不少我高中及本科时期，对一些经典文学意象进行的现代演绎，其中不乏文笔稚嫩的文章，但也多少反映出年少时天真烂漫的心境。我始终钟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美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美，讲究的是一种微妙的境界，一种虚实间的美妙平衡；在阅读过程中，偶尔运气好了，能够窥见古人“镜花水月”的小小一角，仅仅沉醉其中，都会觉得颇为幸运。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当然需要我更多的潜心学习与沉淀，但在再创作的过程中，我也不希望循规蹈矩、照搬前人，而是希望融入自己的独特观点与构思，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解读方式——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连



《别来春半》，刘倩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8月

接古今的思考延续呢？我认为，创作的价值不在于加深文学经典被束之高阁的距离感，而是不断寻找它们的普遍性，以启发更多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也恰恰是它们能够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的的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一座丰富的宝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前人智慧，我在创作各类故事时，都会下意识想到它，并且觉得心安。

20世纪诸多优秀的华语作家也是我的灵感来源之一。他们多数身处动荡的时代，无论是

东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汇，还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都催生出了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民国时期的许多作家，如鲁迅、丁玲、张爱玲、林徽因等，都对我启发甚大。20世纪中后期，许多与我一样拥有海外游学和生活经历的港台作家，如白先勇、三毛、邱妙津、李碧华、黄碧云等，他们笔下的众生百态，曾指引着少时的我去不断思考多元文化间的碰撞和对话，以及它们水乳交融的可能性。虽然我的经历有别于前辈作家们的辛酸坎坷、颠沛流离，但流浪与离散、跨文化语境以及个人身份认同等主题，仍是我目前创作的主旋律之一。从学术、生活到文学写作，正因为见过形形色色的西方作品，才更能对华语作家笔下的无尽乡愁和东方情怀感同身受。

写作多年，不乏有人评价我的风格像“某位作家”，或者“谁谁谁”的影子。我并不与这类评价较真，也认为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重要的是，人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明白其中的异同，并共情理解每个人既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便背负着截然不同的使命与人生追求——即使风格上有相似交汇之处，我们也是全然不同的个体。往往是看似相同的表面之下，更能品味出诸多不同。写作的意义很多，但绝不是为了“成为谁”。岁月流转，春去秋来，往事早已成过眼烟云，但总要有人去倾听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书写它的起承转合，记录它的跌宕起伏。文学创作于我是一场贯彻人生的漫长修练，我挥别了少时桀骜不驯的个性，更加明白在岁月常青的文学殿堂前，自己应该时刻怀揣谦卑与审慎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创作。忠于自我，为自己而写，又何尝不是为世间的千千万万人而写呢？

希望《别来春半》能够带给各位读者的，是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温柔力量。